

南宋方志的湖泊书写

李 昆

提 要：南宋方志对湖泊的书写，仍主要归于传统型地理门类之下，在次级子目名称上有所变化。其内容以湖泊的历史沿革考证和实用价值为主，重人地关系，疏地理要素。虽博引诗文，却又难免冗繁失实。这与当时人在人地时空观念上的转变相关，也是方志“史”与“志”之争的一个缩影。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既承历代之演变而来，又延绵久远，对当下所需史志兼顾之新志编纂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南宋 方志 湖泊 史地思想

中国的方志历史悠久，从《周礼》中的“四方之志”乍现，其发展先后经历萌芽到成熟再到繁荣的阶段。时至南宋，地方志书不论从体例还是内容上来看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体上趋于定型。^①其编纂中最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是发生了由图而志的转变，即通过文字来表现山川、湖泽等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从地理为主到更多地向人文内容扩充。而传统方志发生“史”与“志”的分歧，也正是在此阶段愈加明显。基于此，遂以南宋时期方志中的一类地理客体，即以对湖泊的书写为对象进行分析。

此前学界对方志学的发展和理论的研究以来新夏《方志学概论》，史念海《方志刍议》，还有黄苇《方志学》等为代表，丰富而又成熟。而对于宋这个时段，也成果颇丰^②，具体到南宋则有桂始馨《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洪焕椿《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以及南宋单部志书的研究如李萍《〈嘉定镇江志〉研究》、杨杨的《〈景定建康志〉研究》等。不过以上角度相对宏观一些，对于现存南宋方志中某一地理客体缺乏横向的归纳，就此展开的纵向研究就更近于无。

史念海认为：“方志之为书，自两汉以迄唐末，都是以记地为重，也就是所谓的志。元明以后，却以述人为主，这就是所谓的史了。两者相较，前者是本来面目，后者却不免成为变态。”^③湖泊作为南宋方志中的一大地理要素存在，见证此种“变态”的过程，具有一定代表性，宋人如何书写，对今人有何借鉴，值得讨论。

一 湖泊史话

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湖泊”的概念进行讨论，这是一个看似明确，却又很难说得十分清楚的问题。诚然我们可以从现代自然地理科学的角度进行定义：“湖泊是湖盆、湖水和水中所含物质（矿物质、溶解质、有机质以及水生生物等）所组成的自然综合体，并参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循环。”^④但我们更需要对其进行“史话”，而就历史时期而言，所存历史文献并没有对湖泊进行统一的界定与划分，同时我们也难用完全现代意义的地理学准则去精准确定历史时期

① 参见陈泽泓：《方志定型说析论》，《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2期。

② 参见刘云军：《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期；吴晓萍、郭怡：《宋代方志研究述评》，《史志学刊》2018年第5期。

③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史念海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6页。

④ 王苏民、窦鸿身主编：《中国湖泊志》，“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的研究对象,这确实是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即对于文献文字表述客体的定性定量与现代概念的转化)。在历史时期的气候研究上,对文献文字中的定性描述,甚至感觉性描述,与现代对应的冷暖干湿程度转化关系的建立,学界已有利用物候学方法、比值法、等级法,甚至线性回归法等予以复原。但对于湖泊这一研究客体,则明显仍缺少如此严谨有效的公式和方法。如涉及历史时期湖泊地貌景观的复原、水文特征的探究等,恐又需费一番周折。具体在本文而言,则表现为不同文献在湖泊名称本身上的多样化。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禹贡》记载“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灏、沮会同”^①;“三江既入,震泽底定”^②;“导菏泽,被孟猪”^③。“泽”是其中对湖泊的主要称呼。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以来,其人目湖塘皆为“海”,“海”遂又成为了湖泊最广泛的名称。到了清代,时人对“罗布泊”独具特色的称谓又有“罗布淖尔”等。不同历史时期富于变化的湖泊名称及其含义值得探讨,湖浅者可称为池,深者则为潭,但究竟浅几寸,深几许,却是没有标准的。这或可通过历代文献大量的湖泊表述统计,找出一些规律。但由于这涉及相关史料甚广,且并不是本文探究之重点,因此不深究讨。

本文所用的24部南宋志书中,“湖泊”基本归类于“山川志”“水利”“湖”等专门子目,在此就所涉及有明确名称的“湖泊”表达方式予以统计罗列,有“湖”“池”“潭”“塘”“渊”“泽”“陂”“荡”8种。附统计如下,统计恐有疏漏,仅作参考(详见表1)。

表1 南宋主要方志中涉及湖泊情况一览

方志名	成书年代	编纂者	湖泊名称及数量
乾道《四明图经》	乾道五年(1169)	张津	湖(8)、池(3)、潭(2)、塘(1)
乾道《临安志》	乾道五年	周淙	佚(无载)
《新安志》	淳熙二年(1175)	赵不悔修,罗愿纂	池(1)、湖(3)、潭(2)
淳熙《三山志》	淳熙九年	梁克家	湖(16)、池(4)、塘(181)、陂(158)
淳熙《严州续志》	淳熙十二年	陈公亮修,刘文富纂	湖(2)、池(4)、潭(2)
《雍录》	淳熙十六年	程大昌	池(14)、沼(1)、陂(1)
《吴郡志》	绍熙三年(1192)	范成大	湖(9)、塘(2)、池(1)、潭(1)
《云间志》	绍熙四年	杨潜修,朱端常、胡林卿纂	湖(12)、池(1)、塘(3)、潭(1)

① 慕平译注:《尚书·禹贡》,中华书局,2009年,第54页。

② 慕平译注:《尚书·禹贡》,第58页。

③ 慕平译注:《尚书·禹贡》,第61页。

(续表)

方志名	成书年代	编纂者	湖泊名称及数量
嘉泰《会稽志》	嘉泰元年(1201)	沈作宾修,施宿等纂	湖(114)、塘(32)、池(26)、潭(30)
嘉泰《吴兴志》	嘉泰元年	谈钥	泽(2)、池(6)、湖(13)、潭(9)
嘉定《镇江志》	嘉定六年(1213)	史弥坚修,卢宪纂	湖(9)、池(1)、塘(3)、荡(1)
《剡录》	嘉定七年	史安之修,高似孙纂	潭(2)、渊(1)、湖(1)、池(2)
嘉定《赤城志》	嘉定十六年	陈耆卿纂	池(3)、湖(27)、潭(80)、塘(8)
宝庆《会稽续志》	宝庆元年(1225)	张淏	湖(3)、池(1)、塘(1)
宝庆《四明志》	宝庆三年	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	湖(19)、潭(18)、池(3)
《澉水志》	绍定三年(1230)	罗叔韶修,常棠纂	潭(4)、湖(3)、池(2)、塘(1)
淳祐《玉峰志》	淳祐十一年(1251)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	湖(2)、塘(1)
咸淳《临安志》	淳祐十二年	潜说友	湖(22)、潭(20)、塘(54)、池(27)、沼(1)
开庆《四明续志》	开庆元年(1259)	吴潜修,梅应发、刘锡纂	湖(2)
景定《建康志》	景定二年(1261)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	湖(9)、潭(1)
景定《严州续志》	景定三年	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	湖(1)、池(1)、潭(2)
咸淳《毗陵志》	咸淳四年(1268)	史能之	潭(8)、湖(10)、池(1)、塘(2)
淳祐《临安志》	咸淳四年	施谔	湖(14)
咸淳《玉峰续志》	咸淳八年	谢公应修,边实纂	湖(4)荡(1)、塘(1)

二 湖泊书写

南宋一代，境内湖泊数量之众，是毋庸置疑的，南宋方志中常有表述如“吴中水国”^①，“吾邑素号称泽国，襟江带湖”^②。在上文统计中，如嘉泰《会稽志》中“湖”记载数过百等，淳熙《三山志》中陂、塘皆百十余，便可见一斑。除了数量大之外，其对南宋一朝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也是不平凡的，就文献之中，不仅有列于“地理类”单独子目之下，在自然方面有构造地势、存储水源、调节旱涝之用，更是单独列有“水利”“水路”“水产”等子目，足见其在交通运输、农业水利、社会生产等方面作用明显。此外也是文人墨客的笔下素材，“诗咏”“记”“碑拓”“古迹”之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单单关注传统的“山川”“水”等子目还不够，必须要充分关注和重视其他子目门类。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归属门类

“湖泊”的内容分布所属门类情况，呈现总体归于方志传统型地理门类，次级子目多有演变，不乏一些创新的特点。通观南宋24部方志，除了乾道《临安志》、淳熙《严州续志》皆仅存3卷，淳祐《临安志》仅存第5至10卷外，其他几部书在目录方面都相对完整。从目录设置上来看，实际上没有形成固定的一个子目门类名称专门记载湖泊，而是因人因书而有些差异。

1. 仍以传统型的平目体、纲目体地理门类为主，次级子目多有演变

从南宋方志体例来看，大致分为平目体、纲目体、史志体三大类，具体涉及“湖泊”内容分布又各有不同。首先是传统类型的平目体，即在旧图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形成众多门类的形式，其中有单独的“山”“水”门类以记，以《吴郡志》为代表。^③

其次是对平目体改造的纲目体，即在大类下设目，以纲统目，类例较为清晰，如以嘉定《镇江志》中的地理类《山川志》^④为代表，其中又以嘉定《赤城志》卷19—26《山水门》^⑤所占子目最多。而像咸淳《毗陵志》、咸淳《临安志》及《剡录》等，虽名字有异同，但都属同类。再如景定《严州续志》以卷4《水》总说一州，卷5以后分县而单列《水》一节也属于上述传统型的变异^⑥，同样的还有嘉泰《吴兴志》、宝庆《四明志》和《新安志》。

此外还有不单独成志，而卷分上中下，以“水”作为其中一卷中的一部分内容，以《云间志》为代表：卷中《水》。^⑦与此相同的还有淳祐《玉峰志》卷之上《水》。^⑧《澈水志》、宝庆《会稽续志》也属此类。但其实质上在“湖泊”一节与传统型分类是相似的，即使在更倾向于“人文”的大背景下，仍主要是在“地理”的范畴下，这是历代志书相承的结果使然。

① 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04页。

②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057页。

③ 参见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51页。

④ 参见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宋元方志丛刊”，第2313页。

⑤ 参见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280页。

⑥ 参见钱可则修，郑瑶、方仁荣纂：景定《严州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4378页。

⑦ 参见杨潜修，朱端常、胡林卿纂：《云间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页。

⑧ 参见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053页。

2. 史志体异军突起，不乏一些形式创新

以景定《建康志》为代表，其体例更几乎效仿于正史史书体例，“志”“表”完备，“湖泊”载于“山川志”中，门类齐全，基本是按照纪传体正史的体例来写的，志书“史”的影子逐渐清晰起来。^①

除此外还有完全打破方志传统体例，直接围绕问题考证，以札记形式呈现的，如《雍录》，其往往是涉及一个个与“湖泊”相关的具体问题考证。

总体来说，对“湖泊”的书写大部分仍归于传统型平目体和纲目体的地理类子目中，而存在于史志体之中“志”“表”的形式也并不少见。在此基础上又各自发生一些次一级子目的细微变化。最后还应注意，就实际记载内容来看，“湖泊”又不仅仅局限存在于上述门类，往往如“桥梁”“水利”等相关子目也会有涉及。这种“史”与“志”的冲突和模糊在对“湖泊”章节的归类上还是有所表现的。

（二）侧重方向

就其“湖泊”书写的侧重点而言，虽各有差异，但总体上呈现出以侧重对“湖泊”的历史沿革考证和当世实际效用两大要点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反而是对于“湖泊”本身的地理属性关注不足，有的甚至未涉及。

1. 注重历史沿革与考证

讨论“湖泊”书写上的侧重点，就先要关注到作者编纂方志的初衷，这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对“湖泊”书写的侧重，同时也左右整部方志的着力点。如淳祐《玉峰志》开篇所言：“郡县必有志，独昆山无之，岂前人之长不及此哉？期会之事，有急于此，则谓之急也。”^②对于一地方志有缺失，其编纂是迫切的。但更要看到，就历史时期以来，方志本就孕育于传统舆地之学，注重沿革，长于考证，是其长久以来的最大特点，这一点在南宋方志学家中被部分继承，代表作是《雍录》。《雍录》开篇“五代都雍总说”言自“周秦二世”至“汉隋唐”都雍之沿革，便奠定了全书考证沿革之基调。^③其独特的札记形式，往往以考证一个问题为一小节，在“湖泊”方面表现也尤为突出。既有在总论历代地理沿革时兼论“湖泊”的单一考证，如《阁本大明宫图》中以图证“太液池”位置^④；《汉唐宫殿据龙首山》中“水既能注入，以为之池，则知其池已在平地不在山矣”^⑤，以考证“龙首池”之位置。同时还有单独子目大篇幅的纵向系统考证，如“兰池宫”中从“始皇引水为池”至“（唐）高祖钱之蓝池”^⑥；旁考逸事二三，如“凝碧池”中“禄山乱逆徒，张乐燕于此乐”^⑦。侧重沿革不可谓不详。在其他几部方志中也较为明显，如《吴郡志》中“北池”沿革：“唐在木兰堂后……本朝皇祐间，蒋堂守郡乃增葺池馆。”^⑧淳祐《玉峰志》中“至和塘”沿革：“从古为湖……至和二年知县钱公纪，始修治成

①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325页。

②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051页。

③ 参见程大昌：《雍录》，“宋元方志丛刊”，第379页。

④ 参见程大昌：《雍录》，“宋元方志丛刊”，第406页。

⑤ 程大昌：《雍录》，“宋元方志丛刊”，第413页。

⑥ 程大昌：《雍录》，“宋元方志丛刊”，第455页。

⑦ 程大昌：《雍录》，“宋元方志丛刊”，第459页。

⑧ 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25页。

塘。”^①嘉定《镇江志》中“龙目湖”沿革：“秦时所掘，与《寰宇记》小异……今失其所。”^②咸淳《毗陵志》中“阳湖”沿革：“（刘）宋元嘉修，废，成良畴数百顷。”^③沿革与考证依旧受到修志者的重视，史书的味道越加浓厚。

2. 更关注“湖泊”现实功用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南宋时期的“湖泊”在更广泛的空间和领域影响着人类生活。随着方志的完善渐成体系，其已不仅仅有记录之功用，编者或者说地方政府更有致力于实用之意愿，更关注其对于人的意义。因此更加关注所书写“湖泊”的现实意义是顺理成章的。

这体现在多描述“湖泊”用于农业水利方面，尤以宝庆《四明志》为代表。其开篇序言即言明“观山川之流峙，则思为民兴利事”^④，奠定其侧重人地关系，关注实用价值的基调。如其在“县”目之下的子目“水”中就花大篇幅辨“广德湖”“东钱湖”对水利之利害。^⑤同样，《吴郡志》也是其中代表之一，其单列一卷“水利”分上、下，详述“湖泊”与农业关系，系统论述“至和塘”与水田之“六得六失”^⑥；练湖调节洪旱之功效，以促农业：“记即大水之年足以滌蓄湖瀆之水，使不与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埤无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濳，以浸灌民田。”^⑦这一特点并非一二个例，在嘉定《赤城志》、开庆《四明续志》、淳熙《三山志》、乾道《四明图经》“水利”子目中都有体现。此外还有对“湖泊”之湖产的关注，多是在“物产”之下设“水产”“水族”“鱼”子目。如《新安志》中“往往有鱼而不常得，疏池以养者，多鲤鲩与鲢”^⑧。淳熙《三山志》《剡录》等都同于此类。

3. 更关注人地关系，疏于地理信息

应注意到南宋方志中对于“湖泊”凡有可寻者，必言其沿革，但对其本身之地理属性似乎是不加以描述或可以说不是必备的要素，大量对“湖泊”的书写中，基本固有的信息仅仅是其方位、相对位置以及大小的描述。纵观而言，基本可以总结为“州县+相对州县方位+所距州县道里+湖泊周回”的模式。至于深浅几许，水色、水质怎样，注入流出之径流，季节变化，结冰与否等等，一系列地理属性记载是非常罕见的。纵然如淳祐《临安志》中所载之“西湖”凡千余字^⑨，可谓南宋方志中载“湖泊”最详之一，在地理属性上的记载也仍不脱上述模式。而像景定《建康志》中“在城北二里，周回四十里，东西有沟流入秦淮”^⑩，这样的记载，能多加简述源流者，已算得上是于地理方面所载详细者。配以地图描述者，则更是凤毛麟角，淳熙《严州续志》中图载“西湖”“潜火池”“官池”是为数不多的代表。^⑪再如淳咸《临安志》中

①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057页。

② 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宋元方志丛刊”，第2353页。

③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宋元方志丛刊”，第3090页。

④ 胡榘修、方万里、罗潜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4989页。

⑤ 参见胡榘修、方万里、罗潜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149页。

⑥ 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23页。

⑦ 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35页。

⑧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620页。

⑨ 参见施澧：淳祐《临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3319页。

⑩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586页。

⑪ 参见陈公亮修，刘文富纂：咸淳《严州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4284页。

“浙江图”“西湖图”则实际是清同治六年(1867)补刊所载。^①诚然存在有后世所佚的情况,但这一方面是作者缺少实地的勘探,另一方面也反映其在记载上的取舍选择,更关注于人地关系,多记事记沿革而疏于地理信息。

有宋一代对方志性质的争论中,除传统的地理派之外,史学派的崛起迅速起,尤其自宁宗以来,史学派的队伍壮大,更是与这一变化不谋而合。自北宋以来方志性质由地理向历史的转变,可以肯定在南宋方志中对“湖泊”的书写内容上还是愈发明显。

(三) 书写方法

在书写“湖泊”的方法技巧上,主要呈现着富于文学气息,倾向于旁征博引诗文,而又存在冗繁失实的情况等三个特点,具体如下。

1. 相当富于文学气息

这表现在书写时常活用动词,力求场面逼真。以嘉定《赤城志》记载为例,如“下枕深潭”^②;再如“有飞瀑垂崖而下,石根插水,潏为一潭”^③。以及“水光山色,涵映虚旷,为春夏行乐之冠”^④。“枕”“垂”“插”“潏”等一系列动词,加之出色的文字描述使得整个描写富有灵动感和画面感,读罢犹如身临其境。回头来看嘉定《赤城志》的作者陈耆卿,他博学能文,曾随叶适学习,叶适对他也是十分赏识,尽传所学,并曾作诗赞之:“古今文人不多得,元祐唯四建安七。性与天道亦得闻,伊洛寻源未为失。”^⑤这也不难理解其在文字运用方面的杰出。

其实如陈耆卿也并非特例,细数南宋这24部方志作者,《吴郡志》作者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一代文学大家。梁克家以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而著淳熙《三山志》。乾道《临安志》作者周淙,曾为右文殿修撰,文学功底亦不凡。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非官即士,除了方志学,在文学上也是大有作为。

2. 广泛收集各类诗文加以引用

文人修志的大量出现成就了在湖泊书写上的第二个特点,即普遍地喜欢广泛收集各类诗文加以引用,以表现时人对“湖泊”的主观感受。这同时也可说是“以诗存史地”思想的一次滥觞。正如咸淳《毗陵志》中“山水”目开篇所言:“毗陵山水之秀,著于经,备于图牒,散见于文人墨客之篇咏。”^⑥文人之诗歌、散文甚至碑拓都包含着对于山川形胜地记叙和歌咏。在《吴郡志》中,《白居易泛太湖书事寄元稹》:“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风。避旗飞鹭翩翩白,惊鼓跳鱼拔刺红。涧雪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⑦该诗此几句可谓是行舟太湖时,对其景的细致记录。此外在“杂咏”一目中,范成大还载有大量唐宋时人歌咏苏州山水的诗篇,所涉及的“五湖”“太湖”“彭蠡湖”^⑧也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文章方面,乾道

① 参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3355页。

②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430页。

③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436页。

④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458页。

⑤ 叶适:《水心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32页。

⑥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宋元方志丛刊”,第3079页。

⑦ 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18页。

⑧ 参见范成大:《吴郡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014—1020页。

《四明图经》中引用曾巩的《广德湖记》叙沿革^①，舒亶的《西湖记》述湖景^②，都是其典型代表。

虽然这些诗文往往带着浓烈的主观感情，但修志者认为这些同样是宝贵的史地资料，并将其记录于方志之中。

3. 记载不乏冗繁失实之处

此外，也仍需注意到，文人修方志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章学诚就有过文人不可与修志的论点。^③南宋方志对“湖泊”的书写上也有体现，如篇幅中一味追求大量罗列湖泊名称，而不记其究竟，固然有广收博引之功效，但这不仅不便于知其详况，更有相当多的重名同名“湖泊”而造成混淆。从前文表1统计可以看到，如嘉泰《会稽志》记载“湖”的数量过百，但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仅仅有一句关于其方位的记载，此外如“白马池”“（古今）放生池”较为大众的名称曾多次出现^④，虽然是分县而载，略有不同，但过于分散，且信息简短，难免多生混淆。此外淳熙《三山志》中“陂”“塘”记载数量都过百，但同样绝大多数仅有其名及所属县里，重名现象较多。^⑤冗繁失实，此或是文人修志在“湖泊”书写上的不足之处。

（四）传承今用

南宋方志的湖泊书写是史地思想转变发展的一个缩影，解析这个碎片方能更好地理解整个演变过程，以便做到古为今用。正如史念海的看法^⑥，继续章、戴对志书的“史”与“志”性质的争论意义不大。实则在南宋的方志中对湖泊的书写虽有向人文扩充但也并未完全摒弃传统志书的脉络，历史信息与地理信息在志书中都应该得到重视，这也正是编纂兼顾史志的新方志所应有的理念。此外结合前文，重视编纂对象古今概念的差异；因时因地的确定恰当的编修体例和归类；实地考察与文献结合；把握好编修的文学性和准确性等，也是南宋方志在书写湖泊中留给当下新志编纂的丰富经验。

结 语

南宋时期修志者对志书人文内容的扩充，对人地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以及对现实意义的愈加关注，都是十分明显的。在传统志书走向“史”与“志”之争的途中，南宋时人在方志中对湖泊的书写上，既有“重人轻地”的倾向，但又并未完全摒弃志书的旧有传统。

同样这样的思考方法也可以用于除了“湖泊”以外的其他具体研究对象，如对于自然类的“山”“河”等的书写，把方志的某一类地理客体作为研究对象，或可得以管中窥豹，古为今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宋元方志丛刊”，第4957页。

② 参见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宋元方志丛刊”，第4958页。

③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8，中华书局，1985年。

④ 参见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888—6901页。

⑤ 参见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909—7923页。

⑥ 参见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史念海全集》第6卷，第440页。